日本“水俣病”的社会学研究

程鹏立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出现的“水俣病”等公害事件是环境恶化的主要标志。日本社会学界围绕“水俣病”事件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展开了学术研究,为事件的最终解决和环境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水俣病”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涉及弱势群体、社会结构、性别、社会和文化方面。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对“水俣病”案例的反思,开始研究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以促使政府改进环境治理的政策和措施。这是日本环境社会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种表现。

关键词:“水俣病”;日本;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8)04-0030-04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全面复苏,工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特别是钢铁、矿山和化工企业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是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出现了很多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的环境公害事件,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水俣病”事件。仅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就出现了著名的 4 大环境公害事件(熊本县的水俣病、新泻的水俣病、四日市的哮喘病、富山县的疼痛病),其中两次都是“水俣病”。首例“水俣病”患者出现,官方确认是在 1956 年,1965 年在新泻县又发现了“水俣病”病例。“水俣病”因为首先发生在日本熊本县的水俣镇而得名,新泻县的患者因为相同的致病机理和症状而被确认为患有同样的疾病。但是,“水俣病”并不是一种地方病,而是因工业污染而引起的身体疾病。科学家经过大量的医学和社会调查,弄清了“水俣病”的致病机理:“水俣病”是化学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渣中的甲基汞所致。工厂排出的废水中含有甲基汞,而这些废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措施直接进入了河流和海湾,河流和海湾里的鱼和贝壳因此受到污染。生活在河流和海湾周围的居民食用大量受污染的鱼和贝壳后导致身体器官汞中毒。“这种病症最初出现在猫身上,被称为‘猫舞蹈症’。病猫步态不稳,抽搐、麻痹,甚至跳海死去,被称为‘自杀猫’。随后不久,此地也发现了患这种病症的人。患者由于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被侵害,轻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面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手足变形,重者精神失常,或酣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1]。到 2006 年,已经有 2 955 人被确认为“水俣病”的受害者,但是实际上没有确认的受害者的数量可能是已确认的人数的数倍,这还不包括“水俣病”的间接受害者[2]。“水俣病”引起了日本社会众多有良知的医生和律师的关注,同样也促使社会学界开始关注日本社会的现实环境问题。从“水俣病”事件研究开始,日本社会学者开始了环境及由环境引起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并最终促使了日本环境社会学的诞生[3]。

一、“水俣病”的社会学早期研究

1.弱势群体研究

弱势群体、社会公正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课题。日本社会学对“水俣病”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特色。

对于熊本县和新泻县的“水俣病”患者来说,受害者身份的认定是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从 1956 年开始出现“水俣病”患者到 1959 年,日本氮肥公司一直拒绝承认其工厂排出的含汞废水是“水俣病”的病源。1959 年,熊本大学的研究者认定有机汞是“水俣病”的病因。即使在日本氮肥公司附属医院医生细川护熙博士通过试验,证明了猫食用含汞的鱼后出现了典型的“水俣病”症状后,日本氮肥公司仍旧向外界封锁了这一消息。直到 1968 年,日本氮肥公司才停止向水俣湾倾倒含汞废水,而唯一的

收稿日期:2008-0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7BSH036)

作者简介:程鹏立(1977—),男,安徽池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环境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研究。

原因却是用汞作催化剂的方法已经过时了。1969年,熊本县地方法院才开始受理“水俣病”事件一案。1973年,熊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氮肥公司对熊本县“水俣病”负责。而在此前,于1971年,新泻地方法院判决昭和电工公司对新泻县“水俣病”负责。最后,在2004年10月,日本最高法院认定,中央政府和熊本县政府对1960年1月“水俣病”的扩散负责。即使是这样,“水俣病”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到2006年为止,总共有2 955人被认定为“水俣病”患者,但是近十倍于这个数目的受害者还没有得到官方确认。而且,这种疾病引起的破坏范围仍旧不清楚。由此引发的受害者群体、应负责任的公司和地方、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持续了近50年之久。在这个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冲突中,“水俣病”的患者是最大的受害群体。

对受害者群体分析和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日本环境社会学家户田清撰写的《追求环境的公正》[4]。作者通过对“水俣病”等大量的案例研究之后,把环境问题的受害者分为社会性弱者和生物性弱者。社会性弱者主要包括贫困者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生物性弱者主要包括老、弱、病、残、妇女和儿童。作者指出了环境问题社会不平等的两个方面:富国污染穷国现象和富人污染穷人现象。户田清认为,我们在分析“人类在破坏自然平衡”时,应该清楚是哪些国家、哪些群体在破坏环境,而不是所有人都在破坏环境。那些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环境的国家、企业和个人是环境破坏的主要责任人。他认为,不解决环境问题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就无法解决环境问题,无法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4]。

2.社会结构研究

日本环境社会学的先驱人物饭岛伸子在20世纪60年代就研究了世界著名的“水俣病”事件,她着重分析了环境污染对受害者家庭结构和社区结构的影响。在1992年出版的《日本的工业污染》一书中,饭岛伸子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分析了“水俣病”事件受害者的社会结构。她从4个方面分析了环境污染对污染受害者社会结构的影响:人的生命和健康;生活境遇;性格;社区环境和地方社会。饭岛伸子认为,环境污染对受害者影响的4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是一个连锁反应。“水俣病”、“疼痛病”等由环境污染引起的疾病对个人身体健康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这种伤害产生了系列的连锁反应。如果受害者是家庭的支柱,那么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必然受到影响,而且这种对于家庭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比如家庭的居住空间、生活水平、人际关系和对未来的规划等都会发生重大改变。受害者在与政府部门的谈判中,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以及与社区居民的交流中,人格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通常会导致受害者心中愤怒、憎恨和悲伤等情绪的积累。所有这些问题组合在一起,最后导致当地社区的所有居民都变成了受害者。水俣县周边地区的一些居民受害后在一些机构的帮助下重建了他们的生活,但是其人际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已经没有希望恢复到以前[5]。

3.性别研究

饭岛伸子还从性别的角度分析了环境运动中妇女这个特殊群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受害者群体是环境污染事件中的弱势群体,而妇女则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妇女群体之所以在“水俣病”事件的解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是因为大量的妇女也是“水俣病”的受害者,更重要的是妇女们更加关心她们的小孩、生病的家人和老人。在“水俣病”事件中,由于大多数男劳动力受雇于日本氮肥公司,为了生计,他们很难向公司发起挑战。因此,妇女们成了反抗污染运动的草根力量[6]。水俣镇的母亲们为了反抗“水俣病”,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成立了“日本消费合作社生活俱乐部(Seikatsu Club)”,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作组织。母亲们关心受污染的食品对孩子的影响,她们利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特别是妇女的购买行为,来促进有机农业的发展。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即养育健康的儿童和过上健康的生活将导致社会的改变。这个组织倡导母亲们从670个合作组织购买食品。到1989年,这个组织已经拥有17万人的成员。同时,这个组织也鼓励妇女参与政治,已经有100多位组织成员进入了地方政府部门工作[7]。到今天,这个组织依然在日本社会发生着巨大作用,并且在国际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水俣病”事件受害妇女的反抗污染运动得到了日本社会妇女界的广泛支持。石牟礼道子,一个日本女作家,于1960年以诗歌的形式出版了她的文学作品《日本现代版的悲惨故事》。之后,石牟礼道子则亲身投入到“水俣病”的反抗运动中,并在1968年创建了“‘水俣病’反抗运动市民代表大会”的民间团体。

4.社会和文化研究

从“水俣病”对居民社会关系影响来说,受困扰最大的是在施害者日本氮肥公司上班的水俣镇的居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氮肥公司雇佣了当地50%到60%的劳动力。日本社会是一个封建制度继承性很强的国家,长幼有序、尊敬家长的文化在每个国民心中根深蒂固。在日本氮肥公司的雇员心中,公司既是他们生活的提供者,也是他们的保护

者，就像一个大家长。公司给他们提供生活来源，作为回报，雇员们以信任和忠诚来尊敬公司。当渔民们起来反抗公司的时候，雇员们理所当然地站在了公司一边。因为对他们来说，承认公司“有罪”，就意味着承认公司作为家长放弃了他应负的职责，原先建立的忠诚、信任的关系就会瓦解。虽然很多雇员同情受害的渔民，但是这种家长制的信任文化不允许他们背叛公司。即使家长错了，他们也应该始终表示他们作为子女的孝顺和忠心。这样，整个水俣镇社会就分裂了。汞不仅毒害了人的身体，也毒害了社会关系。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水俣病”拖了那么多年没有得到解决。

“水俣病”不仅改变了水俣湾居民的社会关系，而且改变了几千年来渔民们与大海之间融洽的关系。渔民和他们的家人因为食用了受污染的鱼，成为“水俣病”最早和最严重的受害者。渔民的生活早已深深地嵌入传统的大自然的恩惠中。对渔民来说，大海被视为浪漫的化身、生命的恩赐。对村民来说，很难理解大海也能剥夺他们的生命。对垂死的渔民来说，不仅仅是他们的食物被污染了，就连他们文化中对大自然的根本看法都被污染了[8]。

二、“水俣病”的社会学研究新趋势

日本环境社会学研究继承和发展了其学术传统，但是从总体来看，其研究重点转向了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研究。日本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点转向，实际上是对其研究传统的继承和突破，表明日本环境社会学已经由研究具体的环境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环境治理政策研究。

1.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日本的环境社会学家一直在对政府处理“水俣病”公害事件的态度和政策进行反思。舩桥晴俊回顾了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的两次“水俣病”事件。他认为，如果说施害的公司应该为两次事件负责的话，那么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就应该为因“水俣病”造成的持续50年之久的影响负责。舩桥晴俊严厉批评了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不作为和缺失。他认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是解决众多环境问题的基本前提。而有效处理像“水俣病”之类的环境事件，应该建立一个解决环境污染事件的有效机制[9]：

A 原因发现

A1：污染物的分类

A2：污染源和责任主体的认定

B 污染遏制

B1：发布禁食受污染食物的禁令，遏制直接污染

B2：采取措施停止污染，遏制直接污染

B3：遏制次生污染和次生犯罪，比如偏见、歧视等等

B4：遏制附加的伤害和犯罪

C 环境恢复

C1：受污染环境的净化

C2：对受害者的赔偿和生活重建

C3：施害者的道歉

C4：受害社区的安抚

D 吸取教训

D1：类似环境破坏的防止

D2：吸取教训并进行广泛教育

那么，一个社会如何才能建立上述所讲的处理环境事件的机制呢？舩桥晴俊通过对“水俣病”事件的历史分析，认为促使建立上述环境治理机制有三个基本要素：有效而公正的司法系统、成熟的公共领域、个人行动者的品质。“水俣病”的历史表明，有效而公正的司法系统在环境治理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司法系统也存在着缺陷和制约。首先，司法系统在面对新的社会问题时会出现法律条文表达不足的情况。其次是司法系统的内在制约。这种内在制约要求受害者必须找到相应的法律适用，并且要做充分的书面诉讼准备。而对于缺乏强有力组织和支持的受害者群体而言，诉讼准备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另外，司法系统的缺陷和制约还体现在法院的判决只针对上述4个步骤中的一个，其他问题还需要受害者自行解决。而且，法院的判决通常要让受害者等待很长时间。结果是，一个社会司法系统的独立表现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具有广泛民主意识的公共领域是其中的一个条件。成熟的公共领域要求具有以下特征：平等、批判精神、公开和连续性。它使得一个社会在解决环境问题时有足够的知识、价值判断和最广泛合法性的决定。成熟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又离不开组成社会的所有成员的个人品质。环境问题解决相关的个人品质包括环境价值观、公正观、敏锐的洞察力、研究的技巧和坚定的愿望[10]。

2.参与与环境治理

还有一些日本环境社会学家从研究诸如“水俣病”事件引起的受害者运动入手，来分析这些运动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和环境治理的影响。关玲子基于新泻县安田镇的“水俣病”的爆发事件的个案研究，讨论了受害者在健康调查中的自我参与行动对环境运动的发展和促使环境问题的解决所作出的贡献。在安田镇的“水俣病”的受害者健康调查中，受害者积极配合医生收集关于他们自身健康的数据，使得

调查取得满意的结果。这些数据成为受害者在发起诉讼运动和促使政府解决问题时的最根本的力证。关玲子认为,这个个案告诉我们受害者自己收集相关证据和利用群体的力量十分重要。在环境诉讼中,受害者提供自身受害的相关证据是赢得环境诉讼的关键。关玲子还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辨别和确认因食物发生的健康问题难度更大。但是,当整个区域发生环境污染时,对于区域内受害者的身体健康的调查如果有受害者的积极参与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天,在日本环境社会学界,环境问题的受害者参与研究已经成为热点。这种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对于"水俣病"事件的研究,现在已经遍及全日本[11]。

三、启　示

综上所述,"水俣病"事件等现实环境问题促使了日本环境社会学的诞生,并为环境问题的解决和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环境社会学从一开始注重研究具体的环境问题,到今天开始研究政府层面的环境治理政策和措施。这种转向应该是日本环境社会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目前,中国的环境社会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介绍美国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笔者认为,中国和日本有着更多的文化相似性。因此,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对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有着更强的借鉴意义。

第一,强烈的现实关怀。日本环境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现实关怀精神。正是一大批医生、律师及社会学家的支持和帮助,"水俣病"事件的受害者才最终获得比较满意的赔偿和比较公正的对待。日本社会学家在进行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时,都十分重视收集个案资料,从实证研究到理论概况。而且很多社会学家亲自参与环境社会运动,促使政府采取措施解决环境问题。目前,中国也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发展阶段,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需要包括社会学家在内众多科学家的努力。

第二,理论的本土化。中国环境社会学在起步和发展阶段,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理论是必要的,但是应该注意理论的本土化。日本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并把外来的理论运用于解决本国的实际环境问题。日本环境社会学借鉴美国的理论,并成功实现了本土化,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本土化是一个启示。我们也应该积极学习和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特质,实现其本土化,为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实证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日本环境社会学具有注重实证研究,扎实开展个案研究的特征。在扎实的个案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日本环境社会学致力于构建微观的环境社会学理论①。比如,舩桥晴俊提出了"受益圈"和"受害圈"的概念,并发展成了分析经验研究的理论。中国的社会学家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应该学习日本环境社会学的这种踏实的研究作风,并努力发展自己的环境社会学理论。

参考文献:

[1] 彭俐俐. 20世纪环境警示录[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44-45.

[2] SEKI R. Participatory research by niigata minamata disease victims, and environment of these victi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2006, 15(1):26-39.

[3] MIYAUCHI T. Pursuing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Japan: An introduction ot the special issu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2006, 15(1):1-6.

[4] SMITH E. Minamata[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5.

[5] 户田清. 环境的公正を求めて:环境破坏の构造とェリ□ト主义[M]. 东京都:新曜社, 1994.

[6] IIJIMA N. Social structures of pollution victims.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Japan[M].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2:154-172.

[7] IIJIMA N. Kankyo mondai to higaisha und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victim's anti-pollution movement)[M]. Tokyo: Gakubunsha, 1984:223-250.

[8] DANAHER M. On the forest fringes: Environmentalism, Left politics and feminism in Japan[J]. Transformations, 2003, 6(2):1-9.

[9] IROKAWA D. Minamata no keiji (Minamata revelation)[M]. Tokyo: Chikuma Shobo, 1983:110-115.

[10] FUNABASHI H.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postwar japanese socie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2006, 15(1):3-17.

[11] FUNABASHI H. Minamata disease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2006, 15(1):7-25.

① 王子彦在《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一文中认为日本环境社会学研究"偏重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而缺少理论建构"。笔者认为,日本环境社会研究并不是没有建构理论,而是其所建构的理论大多是微观的,这和日本社会学整体的研究传统有关。具体参见:王子彦. 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研究[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4):85-88.